



社科论丛

CHENGSHIHUASHIYU XIADE
JINDAIHUABEI
CHENGXIANGGLANXI

城市化视阈下的 近代华北城乡关系： 1860～1937

——以京津冀为中心

任吉东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城市化视阈下的
近代华北城乡关系：
1860～1937

——以京津冀为中心

任吉东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化视阈下的近代华北城乡关系: 1860~1937: 以京津冀为中心/任吉东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80688-884-1

I. ①城… II. ①任… III. ①城乡结合-研究-华北地区-1860~1937
IV. ①F29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7370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 www.tass-tj.org.cn

印刷: 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72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专家鉴定一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景泉

该课题成果研究思路明确,结构清晰,论点突出,论证充分,是一部比较有特色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力作。客观地讲,与江南区域和华南区域研究相比较而言,华北区域研究起步略晚,且研究的领域亦不平衡,对华北区域城乡发展的特点更是缺乏系统深入的归纳与总结。归其原因,当然有诸多的客观因素,诸如资料的相对缺乏和不系统、政局变动及战乱等,但与学者们对华北重视不够,对华北区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认识不足也不无关系。

而时至今日,近代华北区域研究已经逐渐升温,在城市、市镇、乡村等各个层面都有涉猎,就如同上海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一样,华北区域是研究近代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桥梁,是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关键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这也正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华北区域的意义所在。

该课题作者拥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常年从事中国近代华北乡村史和华北城市史的研究工作,学术功底扎实,科研工作成绩突出。该课题成果亮点众多,综其大者有以下几点:

第一,观察角度新颖,站位视角准确。中国的近代城乡关系的形成是在一种非自然状态下的基因突变,导致这种基因突变的诱因不是中国社会内部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强大的外力作用,近代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明清之际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使自身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被外国强行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卷入世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近代中国并没有像西方的英、法等国那样真正出现“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近代中国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由于其不是因辽阔乡村土地上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出城市发展变迁的强大推动力量,而是由于西方的介入,使屈指可数但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在广阔的自然经济环境中

率先获得神奇发展,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获得了畸形发展,从而引发了城乡关系的变化,因此,决定近代城乡关系形成的主导和前提是城市化,所以研究近代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从城市化这个视角切入,才更符合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本课题从城市化入手,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表现。

第二,运用综合研究方法,探讨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和规律。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通了城市史与乡村史研究的隔阂,进一步挖掘城乡,尤其是县镇及乡村档案资料,同时注重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借鉴社会学及经济学的理论与计量分析,采用个案和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近代京津冀城乡关系与社会转型作一综合性的考察,并从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结论。

第三,着眼时代特征,注重分析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有的人强调两者的对立,有的人则强调两者的互补,而作者则从城乡关系发展的实质出发,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既不能看成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也不能片面地夸大两者水乳交融的互补性,而是一种既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既有现代化的趋势,同时传统因素仍有重大影响。这一论断有别于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观点,也没有过分夸大两者间互补促进的一面,应该说是到位准确的。

当然,该项成果尚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对华北地区城市网络的细化,对中小城市的关注,从研究空间上,没有兼顾到华北其他地区,如山东、山西;从研究内容上,理论层面还尚显不足,相关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利用。

专家鉴定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思

城乡关系研究是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而逐步开展的,作为独立而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区域而言,华北区域的研究也在逐渐升温,而两者的结合则是近期学术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该项成果基于这个时机立项完成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清末民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已然起步,新旧交替、东西碰撞,对处于社会上层和基层的城市和乡村来说,都是一种不小的冲击,虽然程度有异。中国的地域广大,城乡众多,地区间发展差别很大,只有在分别深入研究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比较其异同,探寻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对整个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基于比较客观和到位的评价,因此开展某些区域内的城乡关系研究,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而相对于江南的城乡研究,华北区域的研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该项成果正是本着这种探索 and 求知的精神,进行酝酿和最终完成的。

该成果研究思路明确,结构清晰,视角独特,该成果提出的近代华北城乡关系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区域特征,包括政治性因素和交通的推进以及城乡关系发展模式和阶段的分析梳理,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独到之处。

第一,资料充实,学风扎实。有关城乡关系的文献资料比较分散、零乱,这给资料的搜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挖掘整理了河北省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等省市县级档案资料,结合清末民国时期相关的报纸、杂志与社会调查,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城乡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资料充分,论证扎实。

第二,选点新颖,视角创新。课题成果围绕华北特有的双核心城市体系,以城市发展类型来探讨城乡关系形成模式,从行政规划治理来划分城乡关系发展阶段,以与江南等地区的比较来凸显本土特点。以模式化的横向归类与阶段化

的纵向断代对近代华北城乡进行全面的历史性理论梳理,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前沿性。所作的经济分类与政治分期是对近代城乡关系理论的有益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前沿理论价值。

第三,方法全面,框架清晰。课题成果利用档案资料与社会调研资料考校鉴定,运用从文献到实地考察,从历史到现实双重性的分析法进行研究,使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提倡。纵观课题全文,从阐释基本概念,到运用史料解读,研究内容涉猎经济、政治、文化与人口诸多方面,从整体上清晰地再现了近代华北城乡关系发展的全景。

任何研究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该项成果也有自身的缺陷,因为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研究的空间跨域较大,难免有蜻蜓点水之憾,仍需对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利用和对论点的进一步思辨拓展。尤其是对城乡经济关系亟待加强,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扩展研究的领域。期待作者能够不断努力,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内容提要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清末 1860 年到 1937 年前后的华北区域,特别是以天津地区为中心的城乡经济和社会关系。一方面具体考察近代华北地区城乡间经济的互动,探讨此种关系对城市以及农村分别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分析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通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总结华北城乡经济关系所表现出的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历史影响。另一方面,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比较近代华北地区城市与乡村社会的共性与异性,探寻在城市与乡村社会中蕴含的同质因素与同位形态,以及在面临相同压力与困境时所采取的相同和不同的社会控制与应对措施,阐释其转型模式与轨迹,找寻其经验与不足,从而为中国社会变迁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书主要内容共分七个部分,第一章“借鉴与反思:东西方学者的城乡关系理论概述”分别论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城乡关系从城乡分立到城乡统一连续体两种观念的转变,以及中国内地学者对上海、重庆、京津等不同地域城乡关系的研究现状及其区域特征,并对城乡关系研究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及领域范围进行了必要的思考。

第二章“演进与成式:传统中国城乡结构与制度网络”重点研究传统时期华北地区城乡体系特征,考察决定其特征的基本要素。首先解析了传统意义上的城与乡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指出了城与乡的渊源与演变;其次论述了前近代城乡关系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了其不同时段阶段特征与发展规律,最后论述了传统城市与乡村社会的制度政策、治理方式,解读了城乡合治体系的城乡基层建制。

第三章“冲击与衍生:城市化推动下的华北城乡体系模式”主要探讨了近代城市发展对华北城乡关系转型的推动作用,分析考察不同类型的城乡经济关系发展模式。一方面探讨了华北地区双核城市体系下的城市化发展特点,指出正是京津城市的相辅相成才形成了华北地区独有的城市网络格局;另一方面从城市化的角度界分了不同类型的城乡经济关系的形成演变及其各自的特点,即通商口岸的城乡腹地化、工矿产业的乡村工业化、交通枢纽的乡村城市化、内陆城

市的城乡滞后化。

第四章“解构与重组:近代华北城乡治理建制模式”重点阐释政治体制演变对城乡关系成型的促进作用,分析行政规划、治理观念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探求城乡关系发展的阶段和分期。首先论述了中央政府对城乡的制度性建设和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界定了近代城乡治理的阶段分期;其次阐释了这种制度安排背后所隐藏的国家政权建设所体现的权力下沉,并从乡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双重话语。

第五章“人文与教育:近代城乡社会文化关系嬗变”集中考察了社会流动与文化心理对城乡关系定型的辅助作用,分析了城乡观念的文化内涵。内容包括传统城乡文化体系形态及近代城乡文化格局变迁,指出了“教育进城”和文化中介的缺失是城乡文化差别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论述了近代城乡新精英的机制养成方式。

第六章“流动与分化:近代城乡人口分布变迁”介绍了传统时期城乡人口概况及发展特点,分析了近代人口城市化趋向与农村农民离乡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华北城市与村落的人口聚合规模以及天津的城乡人口变化规律与特点。

结语部分则总结了近代华北城乡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及人口方面的规律特征,指出近代华北城乡体系在经历了外部力量冲击与内部历史演化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具有后发性社会所特有的面貌和特征,这种特征贯穿在城乡政治、经济与文化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发复杂和多元。

通过对城乡发展历史、城乡政治经济分期及文化人口的比较研究,本文的观点如下:①城乡关系的螺旋循环式发展规律,即初级一体化到中级二元化再重归高级一体化。传统的城乡关系是一种在低水平下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它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依托,满足于简单的自我复制与循环;近代的城乡关系由于受到外力刺激与内力积压的双重作用而趋向于两极化,导致出现城乡分离,这种分离是在城乡各自发展前进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而在经历了二元化的阵痛与自我发育的成熟,城乡在更高水平上的一体化即和谐化成为可能,这种一体化的发展是由近及远,呈辐射状发展,这正好与近代华北区域城市与乡村的发展轨道同步。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对抗性。与传统社会不同,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的吸附能力增强,城乡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和活跃,对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分别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地区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同时,受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城乡经济关系也表现出对抗性矛盾加剧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种互动体现了在特定区场内的震荡和协调,

是一种同脉频率行进中的部分错位与重组,其最终走向为城乡的互惠互利和谐发展。③城乡经济发展的脉冲效应。近代华北城乡经济联系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小城镇发展的模式特点,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初步形成了核心—城乡边缘区—外围的三元结构。其中,贸易市场与政府行为以及交通运输改善对这种联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i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ound 1860 to around 1937, North-China regions, especial in Tianj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specific study on modern North China economic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rural are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limitations, analyz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eep-seated.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other regions, sum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in North China and demonstrate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basing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strive to make comparison of the same and different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urban—rural communities in North China and explore the homogeneity of the factors inherent in society. To explain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track, looking for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so as to find the path in line with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to provide useful lessons in China.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olitical-economy system, culture and population by the comparative, the point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① The spiral circular regular patter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at is from the primary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mediate binary and to reintegration of high-level integration. Traditional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a kind of low level under the integrated model, it rely on self-sufficiency of small farmers production to meet in a simple self-replicating and recycl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odern urban-rural areas is due to the dual role of the external stimulation and internal forces to lead to a separation polarization tend. This separation is a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While after the throes of the dualism and the mature of self-development, urban-rural society getting to a higher level integration (harmoniza-

tion) become possible. Such integr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of near and far, showing radial development,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modern North China regiona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ck synchronism.

② Unbalanced and confrontational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society.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societies, the ad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modern city in North China region strengthen and the economic ties become more close and active, which make a definite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erious inter-regional imbalances existing,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urban-rural society also show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and aggravated character. The other hand, this interaction reflected in a specific area inside the shock and coordination, more than a clock frequency of the moving part of the dislocation and restructuring, with the ultimate direction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areas.

③ Pulse effect of urban-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ties between urban-rural areas in modern North China to demonstrate the model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and in the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show the shape of the ternary structure with core-fringe-periphery. Among them, the market, government action,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 condi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link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目 录

第一章 借鉴与反思:东西方学者的城乡关系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西方学者笔下的城乡关系	(2)
第二节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述评	(13)
第二章 演进与成式:传统中国城乡结构与制度网络	(37)
第一节 传统意义的城乡及相关概念	(37)
第二节 历史的城乡与城乡的历史	(51)
第三节 传统城乡治理体系与制度理念	(60)
第三章 冲击与衍生:城市化推动下的华北城乡体系模式	(69)
第一节 双核体系下的区域城市化	(71)
第二节 通商口岸的城乡腹地化	(76)
第三节 工矿产业中的乡村工业化	(88)
第四节 交通枢纽的乡村城市化	(93)
第五节 传统内陆城市的城乡滞后化	(99)
第四章 解构与重组:近代华北城乡治理建制模式	(106)
第一节 西方模式下的近代城市管理机制	(106)
第二节 自治下的城市与城市中的自治	(115)
第三节 国家建设下的乡村行政化	(123)
第四节 警察制度下的城乡合体化	(137)
第五章 人文与教育:近代城乡社会文化关系嬗变	(144)
第一节 传统城乡文化体系形态	(146)
第二节 近代城乡文化格局变迁	(156)
第三节 城乡文化中介的角色转变	(181)
第四节 城乡新精英的机制养成	(189)

第六章 流动与分化:近代城乡人口分布变迁	(202)
第一节 传统时期城乡人口概况	(203)
第二节 近代人口城乡分化趋向	(206)
第三节 华北城乡人口分布与流动	(216)
结语	(226)
主要参考文献	(228)

第一章 借鉴与反思: 东西方学者的城乡关系理论概述

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产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分工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运动。”^①城市与乡村也是通过一定空间范围中人的社会关系的积聚而形成的地域社会^②,从这个角度来看,城乡关系也是指城市和农村这两大类人们生存空间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依存关系^③。同时,城乡关系中的“城”与“乡”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社会概念,因二者都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各自内部多种多样的关系构成了各自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④

广义上的城乡关系主要指的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包括城乡间的政治、经济、人口、社会、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其本质是城市和乡村两个地理单元之间、两种不同居住形态之间资源配置和流通所带来的地区差异。

对城乡关系的认知通常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将城乡各看作是区域中的一个点,研究城乡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般从人口的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二者分类论述。一是将城乡看作一个线或面,研究某区域内的城乡群体各要素的组成、变化与发展,认为从农村向城市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各种社区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但从总体上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0页。

② [日]富永健一著,严立贤等译:《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③ 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④ 谢维:《从乡土中国到两个中国——谈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虽然由于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城市与农村被截然的区分开来,但是二者又在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中共存,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只有将分化与统一,对立与协调综合起来,从整体的角度才能正确把握城乡关系,城乡个体与城乡整体的发展互为表里,整体为个体创造环境,个体推动整体的发展。严格地说它们是两个连续性承接的研究范围,包括城乡内部空间、外部空间、群体空间乃至更大尺度的体系。^①从某种程度上讲,城乡关系可以将分散的自成一个社区的许多农村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有别于农村的市镇社区,其社会与文化内涵应当说是从农村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也就保留着许多基本相同的一面,但又由于其作为一个社区的功能已经不再等同于农村,因而也存在有别于农村的一面,属于与农村不同层次的社区。^②

第一节 西方学者笔下的城乡关系

虽然城市与乡村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中多个专门领域的热门,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明清两代社会与经济研究的细化与深化,引起了新一轮城乡研究的热潮。但作为独立领域的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夹生状态,“由于传统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大多并不是直接针对城市或乡村而引发,而是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如乡绅地主、地方赋役、商品流通与市场、基层管理、地方治安、地域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研究等,才关涉较多。”^③

与此类似,早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城乡关系的探讨是随着对中国城市认识而开始的,虽然“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正是从研究城乡关系开始的”^④。但城乡关系只是作为城市史的参照物而出现的,“城市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的:城市有其独特之处。如果城市与社会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再把‘城市史’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进行讨论就没有意义。无论城市的特性包括什么——无论它是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既然明确是城市,其特征就应该使其与乡村区分开来。因此,任何综合性的城市史都应

① 张京祥:《城镇群体空间组合》,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冯贤亮:《明清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种学术史理路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④ [美]卢汉超:《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该包括对城乡关系的考察。”^①

由此阐发出的中国城乡关系，鉴于对城市认识的不同而出现前后两种相异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乡性质不同，相互分离。这种观点以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为代表，而对中国城市的观察是韦伯认识的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提出了衡量城市的五大标准，即城堡、集市、法庭、社团等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政机构。根据这个定义，韦伯得出中国从来就没有城市，同欧洲真正的城市相比较，中国的城市仅仅是皇权的象征，而不是经济活动的自然产物。在此基础上，他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强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界分状态，韦伯将自己的看法总结为：“‘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僚驻地，而‘乡村’则是没有官僚的自治聚落。”^②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史学界基本沿袭了韦伯的关于中国城乡的理论断，如沃弗兰姆·艾伯哈德、罗兹·墨菲、格兰·特雷瓦尔萨等，这一论断的特点在于强调中国城市的特殊性，同西方城市相比较，中国传统城市的封建色彩浓厚，仅仅作为行政中心和军事驻地，封建官僚机构统治着城市政治生活，商业活动亦受重农抑商政策的钳制。到了近代，中国城市没有担当起近代化的重任，淹没于中国农村的汪洋大海之中。^③这种建立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的城乡分离理论也是早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城乡关系的总体认知。正如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所强调的“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④

以“冲击—反应”模式著称的费正清也以一种直观的话语表达了对传统中国城乡分离和对立的认识：“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为数极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木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 and 市镇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所以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动上层阶

① 〔美〕周锡瑞著，孟宪科译：《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第21辑，第13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中国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③ 〔美〕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北京与中外古都对比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0年。

④ 〔美〕罗兹·墨菲著，章克生等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